

《毛泽东选集》

英译研究

—— 巫和雄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014037085

A841
39

《毛泽东选集》

英译研究

——巫和雄 著——



A841
39



北航

C172516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选集》英译研究 / 巫和雄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 - 7 - 5161 - 3795 - 6

I. ①毛… II. ①巫… III. ①毛泽东著作—英语—翻译—研究
IV. ①A841②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022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吕 宏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5
插 页 2
字 数 389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缘起和目的	(1)
一 选题的缘起	(1)
二 选题目的和意义	(3)
第二节 《毛泽东选集》英译研究现状	(6)
一 文献综述	(6)
二 存在的问题	(12)
第三节 研究范围、方法和框架	(15)
一 研究范围	(15)
二 研究方法	(16)
三 本书框架	(18)
第四节 几点说明	(19)
一 关于资料来源	(19)
二 关于版本与印次	(21)
三 关于《毛泽东选集》第5卷	(22)
四 关于威妥玛拼音	(23)
第二章 历史回溯:《毛泽东选集》的英译与出版发行	(24)
第一节 单篇毛泽东著作的英译出版	(24)
一 新中国成立前单篇的英译	(25)
二 新中国成立后单篇的英译	(29)
三 《论持久战》的英译——一个个案	(32)
第二节 《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出版	(36)

一 《毛泽东选集》英译的发起	(36)
二 《毛泽东选集》英译的四个阶段	(37)
三 《毛泽东选集》(6—9 卷)的英译出版	(51)
四 各种毛泽东文集的英译出版	(54)
第三节 小结	(57)
第三章 文本内外:多元视角下的《毛泽东选集》英译研究	(59)
第一节 语言维度	(59)
一 《毛泽东选集》译本面貌的历时变化	(60)
二 《毛泽东选集》英译修订的类型分析	(70)
三 基于语料库的语言分析案例:“自由主义”的英译	(81)
第二节 政治视域	(86)
一 翻译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87)
二 《毛泽东选集》英译中的删节和注释问题	(91)
三 《毛泽东选集》经典化过程中的翻译参与	(106)
第三节 翻译策略视角	(113)
一 《毛泽东选集》英译的基本流程	(114)
二 《毛泽东选集》英译的特点	(120)
三 《毛泽东选集》英译策略的历时变化	(124)
四 《毛泽东选集》英译策略的共时差异	(133)
第四节 小结	(137)
第四章 集体话语:《毛泽东选集》英译中的译者群	(139)
第一节 译者构成与角色定位	(140)
一 译者构成	(140)
二 角色定位与分工	(142)
三 外国译者	(146)
第二节 《毛泽东选集》英译与佛经汉译比较	(153)
一 佛经汉译的历史沿革与译场职司构成	(153)
二 《毛泽东选集》英译模式与佛经译场的异同	(160)
三 集体翻译方式的传承	(166)
第三节 译者群主体性探讨	(171)

一 翻译的主体和主体性	(171)
二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	(175)
三 译者群主体性的发挥	(177)
第四节 小结	(185)
第五章 域外之行:《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传播与接受	(187)
第一节 《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传播	(187)
一 译本传播要素分析	(187)
二 《毛泽东选集》英译本在欧美地区的传播	(191)
三 《毛泽东选集》英译本在亚非拉地区的传播	(194)
第二节 《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接受	(195)
一 实用型接受	(195)
二 研究型接受	(198)
三 影响译本接受的因素	(202)
第三节 国外毛泽东著作英译及其意义	(206)
一 国外毛泽东著作英译举要	(207)
二 国外毛泽东著作英译的特点和意义	(215)
第四节 小结	(220)
第六章 结论	(222)
第一节 回顾与总结	(222)
第二节 创新与不足	(224)
一 本书的创新点	(224)
二 本研究的不足	(225)
第三节 反思与展望	(226)
一 研究中的反思	(226)
二 后续研究展望	(228)
参考文献	(230)
附录	(249)
附录 A 国内《毛泽东选集》(含单篇著作)译事年表	(249)

附录 B	部分《毛泽东选集》英译相关原始文件图片	(252)
附录 C	参加《毛泽东选集》英译主要人员简介	(263)
附录 D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各英文修订稿	
	原稿第 1 页图片	(278)
附录 E	《毛泽东选集》中“自由主义”一词的英译对照表	(283)
附录 F	爱德乐关于《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 5 卷的	
	修订意见稿	(289)
附录 G	伦敦版《毛泽东选集》专名索引	(296)
后记		(369)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和目的

一 选题的缘起

作为一门学科,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的建立与发展离不开对翻译史的梳理,离不开对具体的翻译实践活动的细致描述与总结。换句话说,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重大翻译事件和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翻译家理应成为翻译研究者考察的对象。事实上,国内外翻译学界也正是这么做的。大到浩繁卷帙如《圣经》和佛经的翻译,小到短短几行文字的演绎,只要具备标本意义,都可以成为研究者的工作素材。大大小小的译事,形形色色的译人,对这些人和事的研究如同一片片拼图,汇聚起来,就形成了一幅相对完整的翻译研究图景。

然而,至少从中国的角度看,眼前的这幅翻译全景图还算不上完美。纵观几千年的中国翻译史,从有据可考的周朝开始^①,历代翻译活动大体都有或简或繁的记述,在翻译理论体系上也有了“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的演进总结^②,及至当代翻译学科的创立兴起,国内研究者对翻译史的梳理和翻译理论的探讨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在学习借鉴西方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传统元素,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积极尝试与西方译界展开互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自“五四”以来的近百年间,研究者的眼光可谓无孔不入,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都有所涉

① 参见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增订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2页。

② 参见罗新璋《翻译论集》(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8—19页。

及,探讨问题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对翻译史上的绝大部分重要活动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考察。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有些论题还得到了更加多维的全新阐释。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后文将专门阐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场规模宏大的翻译活动却遭到了翻译研究者不应有的冷落,使得翻译全景图上的那一块显得暗淡无光。这就是《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的翻译。

作为20世纪全球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之一,毛选不仅在中国出版了几亿册,还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发行到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①“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1972年访华时对毛泽东说的这句话绝非出于客套的外交辞令。毛泽东从未去过除苏联以外的其他国家,但毛泽东思想却在亚非拉甚至欧洲北美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从委内瑞拉已故总统查韦斯对毛选的熟稔程度即可窥见一斑。^②

思想的传播离不开一定的载体,毛泽东著作(特别是毛选)有组织、有计划的对外出版发行为毛泽东思想在异域的生根发芽奠定了基础,而这基础的基础就是翻译。毛选的外文本也许不像《毛泽东诗词》在世界范围内流传得那么广,^③但是从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来看,它无疑更具有影响力。

毛选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体现,它收录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著作。这些著作对推动中国社会历史的进步,夺取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都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毛选在世界范围内的出版发行则将著作中体现的毛泽东思想

① 据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1977年7月编印的《毛主席著作出版统计(1949—1976)》,中国1949年10月至1965年共出版各语种(包括汉语、少数民族语种和外语等)《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4586.8万册,折合1146.7万部,1966年至1976年则出版了96486万册,折合24121.5万部。这还不包括非官方出版单位私下翻印、出版的数字。转引自方厚枢《“文革”十年毛泽东著作、毛泽东像出版纪实》,载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第3卷(现代部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页。

② 查韦斯说他“整个一生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甚至能说出毛主席某段语录出自毛选的第几卷。见何明星,“红色经典的海外遗产”,载《南风窗》2009年第2期,第90页。

③ 叶君健认为,《毛泽东诗词》作为文学名著,“它的欣赏价值高,群众性强,远如南美洲的巴拉圭和地中海一角的希腊都有毛诗的译本”。见叶君健《欧陆回望》,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5页。

有效地传向国外，特别是对第三世界有着类似历史经历的国家进行民主和民族解放斗争具有借鉴作用，推动了这些国家的发展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毛选的翻译工作无疑扮演了桥梁的角色，并且有充分理由被关注。

以英译为例。从狭义上来看，毛选的英译自1950年5月中宣部成立英译毛选委员会开始，到1977年毛选第5卷英文版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整个过程历时将近三十年。这次规模空前的译事活动汇聚了当时国内一流的翻译大家，还有长期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专家，无论是时间跨度、原文本的特殊地位、译者群体的强大阵容，还是翻译过程的精工细作以及译文的广泛影响，都使得毛选的英译成为译学研究中不可多得的经典案例。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方面一直没有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对它的研究寥寥无几，仅有的论述也缺乏系统性，且错漏较多，与当前翻译研究的发展形势极不相称。因此，本研究将在厘清事实的基础上尽可能还原毛选英译的历史面貌，并突破旧有的研究框架，从更全面的视角、更丰富的层次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为填补中国翻译史研究中的这一段空白作出积极尝试。

二 选题目的和意义

对于毛选英译的探索既是个案研究又是历史考察。鉴于人们（包括普通读者和翻译研究者）对毛选英译大量存在的误解与误读，本书将着力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这两个问题，即：毛选英译的真实面貌究竟是怎样的？形成这种面貌的原因是什么？

最具权威性的、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毛选初版发行于20世纪50年代初，其英译工作也几乎同时展开，不过考虑到构成毛选的单篇早在那之前几十年就已经面世并被译成英文，毛选英译研究的时间范畴应该相应前移至20世纪20年代。这样一来，本书考察的内容从时间上来看将跨越半个世纪，其间各阶段的翻译实况，包括组织形态、译者构成、修订情况等，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为今天的我们所准确了解，都是需要厘清的。本书力图以史料为基础，对这些情况进行历史的还原，为读者呈现一个相对完整、客观的毛选英译全貌。

正如勒菲弗尔（Lefevere 2004a: 14）所说，“翻译并不是在真空中进

行的”^① (“Translations are not done in a vacuum”), 它也不仅仅是语言层次上的转换, 而是社会和文化的产物, 自始至终处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之下, 如操控学派所提出的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毛选的英译之所以以当前的面貌出现, 与其背后的种种制约因素是分不开的。本书的另一个关注点就是这些因素的发挥机制, 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尝试从超越语言的视角考察翻译过程中的一些现象, 挖掘其背后的深层意义。

随着翻译研究领域“文化转向”的深入, 人们更多地把目光投向翻译实践的具体操作者(即译者), 以及与之相关的多种因素, 比如, 译者的主体性、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对翻译的操控等。尽管翻译研究的对象越来越宽泛, 涉及的因素越来越庞杂, 但不可否认的是, 译者始终是翻译活动中的主体。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译者的每一个行为都不会是无意之举, 相反, 它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译者自己的意愿或外界施予的影响。换句话说, 译者要么力图发挥自己的主体性, 要么“受制于人”, 尽可能抑制自己的主体性, 即所谓的“隐身”。

对于译者的研究, 众多学者已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过从现有的讨论来看, 学界似乎把“译者”理想化或理论化了, 他们研究的对象一般都是默认状态下的唯一个体。但事实上, 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往往并非“单兵作战”, 而是以“译者群”的形式存在。他们相互协作, 共同完成某一翻译任务。从事毛选英译工作的就是这样一个群体。由于作者特殊地位及政治斗争的需要, 在组织翻译毛选时汇聚了一大批国内顶尖的外语学者和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 这些译者分别来自不同的单位(如外交部、中宣部、新华社、各大高校等), 有着各异的生活和工作背景, 为了完成一个共同的任务而走到了一起。尽管他们对翻译中的问题都持有自己的看法, 但最终的译文定稿只能有一个, 那么形成最后定译的过程必然充满了协商与交锋^②。这个译者群体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内部关系(这里所指的关系不单指人际关系, 还包括对译本选

① 如无特别说明, 引文译文系本书作者提供, 下同。

② 翻译过程中的争论是常有的事, “有时争得面红耳赤, 但大家为了搞好译文, 不仅对此毫不介意, 而且通力进行合作。经过反复交锋, 往往可以取得大家满意或较为满意的译法”。见程镇球《毛选英译回忆片断——纪念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 载《中国翻译》1993年第6期, 第2页。

择、翻译策略选择等问题的态度),还要考虑原作、原作者、翻译组织者和读者等多种因素。作为群体存在的译者与理想状态下的个体译者在很多方面都会有所不同,他们之间的这种互动以及与翻译组织者(部门)之间的关系无疑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这也是本书需要探讨的一个重点。

此外,组织翻译毛选的主要目的是向国外介绍我国革命斗争的情况和毛泽东思想,事实上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特别是对第三世界有着类似历史经历的国家进行民主和民族解放斗争具有借鉴作用。那么,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毛选英译本被其他国家人民接受的情况如何,翻译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同样是本研究的内容之一。

概而言之,本书将主要以译本和翻译过程中的原始文献梳理为基础,以译者研究和翻译过程研究为重点,以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理论为参照,对毛选英译进行全方位的立体透视,以期对这一重大翻译活动作出清晰的描述和恰当的评价。

毛选的英译肇始于八十多年前,当年参与这项工作的那些人大都已经过世,仅存的几位年事已高,对当时的情况已无法清晰准确地记起,同时,大量原始资料在人事、机构的变迁中散佚,这使得毛选英译的研究成为一项抢救性的工作。然而,作为中国翻译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毛选的英译研究至今由于种种原因而乏人问津,与之相关的零星讨论不足以让人看清这个伟大的系统工程真实面貌(详见下节),全面系统的多角度研究在目前形势下自然显得异常必要和迫切。作为一种新时期翻译学理念观照下的尝试,本研究对这一重要翻译活动进行个案考察,可以填补翻译史研究中的一段空白,无论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探讨的角度上都比以前的研究有了很大的突破,因此具有较高的创新意义。同时,翻译学界的研究重点一直以来都偏向文学翻译,大量存在的政治文献翻译却很少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对于毛选英译的研究在这方面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当然,由于作者学力有限,加之客观条件的匮乏,本研究仅仅是一个开端,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待拓展,希望它能起到引玉之砖的作用,激起更多人的关注和研究兴趣。

第二节 《毛泽东选集》英译研究现状

一 文献综述

尽管毛选英译工程浩大,名家云集,译作质量令人叹为观止,人们却很少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去关注它。到目前为止,真正以毛选的英译为讨论重点的文章或书籍寥寥无几,更多的文献只是偶有涉及而已。下面从一般论文、著作和学位论文三个方面分别进行讨论。

从现有资料看,目前对于毛选英译的研究大多侧重于零星的翻译技巧讨论或译例介绍(如庄绎传 1962;林汝昌 1963;王若芸 1964;程镇球 1978;汤钟琰 1979;爱德乐(Sol Adler) 1980;吴东之 1985;肖卫仪 1992;罗靖 1996;费小平 2002;杜洪洁 2008;等等)。在以上这几篇文章中,前四篇的作者与爱德乐都亲身参与了毛选的英译工作,其中程镇球与爱德乐更是在那次翻译工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在文章中的论述可以视为具体翻译经验的总结,而汤、吴、费等三人的文章以质疑的眼光对毛选英译本中几篇文章的某个方面进行讨论,肖文和罗文则从技巧学习的角度介绍了毛选英译过程中的某些值得借鉴的处理方法,杜文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对比分析了毛选和《邓小平文选》英译中的译者主体性问题。前9篇文章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从语言层面(词汇、句法、语篇等)展开讨论的,视角比较单一;最后一篇成文时间较近,切入的角度体现了翻译学发展的趋势。整体而言,这些论文大多发表于毛选英译过程中或英译工作刚刚结束时,近期也有零星文章在这方面进行探讨。从早期几篇文章作者的身份来看,他们大都是亲身参与毛选翻译的译者,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毛选英译研究在当时的排他性,而随着时间的发展,“普通人”对毛选进行研究的条件越来越成熟,巫和雄于2007年和2008年各发表了一篇文章,在简要梳理毛选英译历程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研究的框架,奠定了毛选英译本体研究的基础。

毛泽东著作外文本的出版发行是翻译活动的延续,与之相关的文章为系统研究毛选的英译提供了必要的信息。这方面的文章有龚育之(1984)、雍桂良(1993)、郭选(1996)、武生(1997)、刘忠(2007)和亘火(2009)等,其中所涉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英译毛选的基本情况。

除了以上这类论文外, 还有些随感回忆类的文章, 其中也包含了一些跟毛选英译相关的信息 (如王佐良 1983; 程镇球 1993; 庄绎传 1995; 张培基 2001; 王冰 2002; 姚小平 2003; 尹承东 2004, 2009; 杨茂森, 晓明 2004; 杨兆麟 2005; 夏明星, 吴宏伦 2005; 杨绛, 吴学昭 2009; 刘彭恺 2010; 等等)。其实, 这类文章不能算是研究毛选英译的学术论文, 其作者之所以进行这样的写作, 主要是为了纪念一个人、一件事, 而于其中顺带提及毛选英译的部分情况。但是, 他们的着眼点虽然不在翻译本身, 却可以为我们从事毛选英译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帮助我们获取和毛选英译出版及译者有关的信息, 比如, 毛选英译的组织情况, 参加英译工作的都有哪些人, 他们在其中各自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此类文章对于全方位地研究毛选的英译情况也是不可或缺的。

从专著角度看, 目前唯一较为系统地讨论毛选英译问题的著作是出版于 1980 年、由我国著名翻译家程镇球先生编写的《翻译问题探索——毛选英译研究》。程镇球自 1960 年起参加毛选第四卷英译定稿及前三卷英译修订工作, 是毛选英译专家。该书是他从事这项汉译英工作实践的经验总结。在书中, 他首先从理论上论述了翻译的种类、翻译中的主要矛盾和翻译的标准问题, 然后用大量译例分别从词汇、句法和修辞等方面详细阐述了翻译过程中的处理方法。跟这本书有点类似的是庄绎传 (1979) 编写的《汉英翻译 500 例》, 该书从毛选和其他重要政治文件英译本中引用了大量例句, 从各个角度对比汉英两种语言的不同之处, 从而为翻译实践提供经验上的指导。

2002 年 9 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翻译论文集》, 书中收录了近 10 篇程镇球先生发表于各时期有关政治文献 (包括毛选) 英译的文章。该书是对《翻译问题探索——毛选英译研究》的一个补充。此外, 刘金田、吴晓梅 (1993) 和刘跃进 (1999) 分别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毛选各版本 (包括英译本) 的编辑、出版情况作了详细介绍, 其中涉及毛选英译的部分篇幅虽然不多, 却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1999 年, 新星出版社为纪念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成立五十周年, 出版发行了《中国外文局五十年》系列文集 (包括史料选编、大事记和回忆录等), 该丛书记录了外文局过去五十年发展历程, 其中也包含了一些跟毛选英译的组织、规划、出版相关的珍贵资料。

特定时期的学位论文往往能够反映该时段的研究热点。在过去的几十

年中,真正以毛选英译为主题展开的学位论文共有9篇^①(罗丹丹2003;于江霞2005;王鼎毅2006;李亚秋2008;王家银2008;张艳丽2009;付广军2009;孙莉2010;陶陶2011)。不难发现,这几篇硕士论文都完成于21世纪的最近十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系统的毛选英译研究在过去一直没有受到重视,而近几年这一情况则有所改善。

在《〈毛泽东选集〉(1—5卷)习语汉英翻译研究》中,罗丹丹关注的是“从文化人类学的立场出发,以符号学为切入点,系统探讨文化差异对毛选(1—5卷)习语的三类符号学意义(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的影响,归纳出毛选(1—5卷)习语汉英翻译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罗丹丹2003:摘要)王鼎毅在《〈毛泽东选集〉中文化负载词汉英翻译研究》一文中同样运用了符号学的语义理论,不过其讨论焦点从习语转移到了毛选中的文化负载词上。李亚秋的论文《政治性文章中文化成分的翻译策略——〈毛泽东选集〉英译本个案分析》与之类似,以毛选(第1卷)的英译本为个案,探讨了政治性文章中文化成分的翻译策略问题。孙莉以毛选第4卷中的成语为研究对象,“总结了毛选(第四卷)中成语翻译标准并确定了七大翻译策略(直译,意译,替代,省略,增益,加注,概略化),进而提出了成语翻译策略的倾向性,即直译是成语翻译的首选”。(2010:i)从严格意义上说,这4篇论文并不是毛选英译的本体研究,其作者只是将毛选作为译例来源加以利用,却没有触及跟毛选英译更加紧密相关的因素。换句话说,抛开毛选不谈,对习语(成语)翻译和文化负载词翻译的讨论照样可以进行下去。同时,这些论文中有关毛选英译的描述与事实有不符之处。

于江霞在《〈毛泽东选集〉英译比较研究》一文中试图“从两种不同版本的英译本比较研究着手,从翻译的层面对毛选这一思想巨著远视近瞻。通过译本对比分析,探究其差异根源,旨在对非文学翻译,尤指对政论文翻译提出一些构想和思路”。(于江霞2005:摘要)文章首先从文本视角对毛选两个英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分别从文体学及词汇层面、句法层面、语篇层面进行剖析,对两个译本做了优劣评判,接着讨论了毛选中典故的翻译,指出两个译本的策略选择及“归化”和“异化”在政论文献翻译中的运用,最后检验了“意识形态”和“功能对等”理论在翻译过

^① 统计数据截止到2012年9月。

程中的适用性。这篇论文在突破毛选英译的语言视角方面做了一定的尝试,但是整个文章论证的前提却并不可靠。作者认为,在伦敦出版发行的4卷本英文版毛选是当时的英共总书记波立特带领一帮英共党员翻译完成的^①。其实,“伦敦版”的英文毛选也是在国内翻译的,译者绝大部分是中国人,其中就有钱锺书、金岳霖等学界名流,也有几个外国专家,但只是少数。(参见第二章第二节第二小节)由于对史实掌握得不够准确,其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也就随之降低。

陶陶在《操纵性与译者主观能动性在〈毛泽东选集〉英译中的对抗》一文中借用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来研究毛选翻译,着重探讨了译者主体性问题。该文认为,译者主体性的哲学内涵应包括“主观能动性”以及“受动性”。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既有主观能动性,享有“自由”和“权利”,又受到多种因素的操纵,受到“受动性”的制约。“主观能动性”和“受动性”共同构成“主体性”,既没有完全的“主观能动性”,也没有绝对的“受动性”。不同的只是,究竟是“主观能动性”的力量更强,还是“受动性”占据上风。就毛选而言,英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虽未完全消失,却受到很大限制,使译文呈现出“忠实于原文”的特点;但因主观能动性终未消失,译文又同时呈现出了“形象”和“灵活”的特点。这篇文章具有较高的理论起点,也抓住了毛选英译中的核心内容,理论阐述圆融自洽,但论证过程稍显不足,具体表现在:论据与论点脱节,有套用理论之嫌,从而导致说服力欠缺。究其原因,可能是细读文本不够,在写作过程中先设定好理论框架,再寻找例子加以证明,对于这些例证是否能够说明问题则考虑得不多。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张艳丽的论文《意识形态对政治文献翻译的操纵——以〈毛泽东选集〉翻译为个案研究》中。该文以毛选英译为个案,讨论了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控。尽管文章认为毛选翻译中存在着大量意识形态操纵的痕迹,但所给出的例证分析不足以让人信服。先有结论,后有论证,这样的论文写作模式值得我们警惕。

^① 其原文是: The second version i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a group of British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led by Harry Pollitt... The translating and editing turned out to be a success because of outstanding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ll with strong linguistic competence. 见于江霞《〈毛泽东选集〉英译比较研究》第13页,四川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

计算机技术在语言研究中的应用拓宽了翻译学科的视野,同时为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提供了新的手段。莫娜·贝克尔(Baker 1993: 243)指出,“利用大型的原文加译文的语料库,加上语料库研究方法的探讨,将使翻译研究者得以揭示翻译文本作为沟通媒介的本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批翻译理论家开始将语料库和翻译研究结合起来,并取得了显著成果。国内也涌现了大量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论文,王家银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两个英译本数据统计对比分析》和付广军的《基于语料库数据分析的〈毛泽东选集〉英译本总体语言风格考察》这两篇论文即尝试在研究毛选英译的过程中使用了语料库方法。王家银主要采用基于语料库的定量分析方法,对毛选第1卷的中文文本以及其两个英译本(1954年伦敦版以及1965年外文社版)进行了对比研究。通过对某些词汇特点(包括类符总数、型符总数、类型符比、句子总数、平均句长、词长和文本可读性)和句法特点(包括并列句和复合句、被动句、定语从句和假设句)的对比分析,作者认为,与伦敦版相比,外文社版用词较少,词长较短,并且句子较短,在词法和句法特点上更接近原文本。付广军的研究集中在译文文体风格的探讨上。他根据文体学研究成果设定若干文体标记作为参数,采用外文出版社出版于1961年至1965年的毛选前4卷作为语料,然后将其与英国国家语料库(BNC)中相近文体即政论文的源语语料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它作为翻译文本与原创文本文体上的异同;再将其与《红楼梦》英译本语料进行对比,探寻它与非政论文翻译文本在语言风格上的异同。经过统计分析,作者发现,与原创政论文体相比,毛选的译文倾向于简洁明晰;与非政论文翻译文体如小说翻译文体相比,毛选的译文倾向于连贯易读。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大大提高了研究中描写的客观性,但英汉两种语言分属特点迥异的语系,能否以相同的参数(如词长、句长、类型符比等)来衡量比较文章的文体风格尚需进一步研究,论文所得出的结论也有必要通过其他方式加以验证。

除了专文讨论毛选英译,还有一些其他主题的文章也涉及毛选的英译。如王栩(2006)在总结程镇球关于政治翻译的理论时,大量运用了毛选第一、二卷中文化负载信息的译例。韩媛媛(2010)为了说明译者主体性与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就毛选和《邓小平文选》中译者主体性的不同发挥作了简要的对比分析。